

# 银行“70后”高管加速补位



银行高管团队调整步伐加快。3月12日，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，开年至今，已有近20家国有大行、股份制银行、地方性银行董事长、行长、副行长等职位人选出现变动，“补位”的人员中，“70后”也越发突出。在分析人士看来，借人事调整之机，引入年轻化更有开拓创新的领导层，更有利于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和创新。

## 流动频频

2023年，银行高管变动已成为常见现象。据北京商报记者梳理，截至3月12日，已有近20家银行董事长、行长及副行长等职位发生

变动。工商银行、中国银行、建设银行日前同日“官宣”迎来新的副行长。根据公告，3家大行新上任的3位副行长分别是段红涛、张小东、王兵。

从工作履历来看，在加入工商银行之前，段红涛一直在建设银行工作，曾历任湖北省

分行长江支行行长、省分行合规部总经理、人力资源部总经理，2009年7月起历任湖北省分行行长助理、副行长，2014年12月任青岛市分行行长等职位。

张小东2018年3月至2022年12月就职于工商银行，曾历任工商银行私人银行部总经理、工商银行办公室主任、人力资源部总经理等职位，自2022年加入中国银行，并于2023年3月起任中国银行副行长。

王兵则是一位“老中行人”，长期在中国银行工作，曾任该行江苏省分行行长助理、宁波市分行行长、江苏省分行副行长、行长等职务。2018年12月至2022年12月任中银香港（控股）有限公司及中国银行（香港）有限公司副总裁，其间曾兼任中银国际英国保诚信托有限公司、中银集团信托人有限公司董事兼主席及中银集团保险有限公司董事。

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，目前，中国银行、建设银行官网高级管理层列表中，已更新了张小东、王兵2位副行长的任职信息。农业银行则在年初迎来了新任行长，1月20日，该行发布公告称，付万军自当日起就任该行副董事长、执行董事、行长等职位，随着付万军的

到任，农业银行“一正五副”的管理层格局也正式形成。

上述案例只是今年大型银行高管人员频繁变动的一个缩影，股份制银行、地方性银行的变动也较为频繁。在股份制银行中，兴业银行新添2位副行长，华夏银行、恒丰银行分别新添1位副行长。地方性银行中，3月7日，北京银行发布董事会决议公告称，同意聘任戴炜、韩旭为该行副行长，其任职资格尚需取得监管机构核准。西安银行也在近日“官宣”，监管已核准刘强任该行副行长的任职资格。

## 加速年轻化

梳理银行管理层变动原因来看，主要是工作调整、个人原因等缘由。新人“补位”，银行高管的接任人选越发年轻化，“70后”高管在银行中也越发突出。

从年龄上来看，中国银行新任副行长张小东、建设银行新任副行长王兵均是“70后”，二人均出生于1972年。六大国有行中，也有部分高管为“70后”，例如，工商银行副行长张文武出生于1973年，副行长张伟武出生于1975年；建

设银行副行长李运出生于1973年；农业银行副行长张毅出生于1971年，副行长刘加旺出生于1975年；交通银行行长刘珺出生于1972年；邮储银行副行长杜春野出生于1977年。

高管年轻化将有助于培养创新性思维，更有利于推动银行数字化转型，增强银行的竞争力。

零壹智库特约研究员于百程指出，借人事调整之机，引入年轻化更有开拓创新的领导层，更有利于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和创新。在当下银行业进入数字化、精细化发展的市场背景下，业务调整和高管的变动都可能增加，人才在各类机构之间也会多向流动。

正如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所言，银行业转型时期，需要更多的“年轻人”进入管理层，促进银行机构的革新和新业务的开拓，以适应银行业在存量竞争的新时期精细化、特色化经营的需要。当前，银行业在转型过程中充满挑战，需要更多的新老“血液”配合，在稳定经营的前提下，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、系统性地迈向新的发展方向。

北京商报记者 宋亦桐

# 居民短贷高增 2月金融数据继续超预期

2月新增信贷创同期历史新高，“居民弱、企业强”结构有望改善。据央行官网最新披露的金融数据显示，2月信贷强势回暖，除了企业贷款新增明显，居民短贷也出现高增。在业内看来，这预示着居民消费和楼市销售在回暖，反映目前居民消费和房地产处于恢复阶段。后续，新增信贷仍将保持合理适度增长，“居民弱、企业强”的结构有望逐步改善，国内稳健货币政策将偏积极，继续为宽信用营造有利环境。

## 新增信贷创同期历史新高

2月人民币新增贷款需求回升明显。数据显示，2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21.56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1.6%，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.3个和0.1个百分点。此外，2月人民币贷款继续放量，增加1.81万亿元，同比多增5928亿元，新增规模续创同期历史新高。

分部门看，住户贷款增加2081亿元，其中，短期贷款增加1218亿元，中长期贷款增加863亿元；企（事）业单位贷款增加1.61万亿元，其中，短期贷款增加5785亿元，中长期贷款增加1.11万亿元，票据融资减少989亿元；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增加173亿元。

比较数据变化，2月企业贷款仍为新增主力，具体来看，2月企（事）业单位贷款增加1.61万亿元，同比多增3700亿元；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1.11万亿元，同比多增6048亿元。

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，这主要是节后复工复产和生产经营活动加快，2月制造业PMI跃升至52.6%，制造业活动以十多年来最快的速度扩张，带动企业融资需求继续回升；同时，财政支出前置和项目加快落地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撬动的基建配套贷款，以及政策支持下的制造业贷款、房地产行业融资，仍是当前新增信贷的重要推动。

另外，2月居民短贷出现高增。具体来看，2月住户贷款增加2081亿元，同比多增5450亿元，在去年低基数下，同比明显改善。其中居民短贷增加1218亿元，同比多增4129亿元，处于相对高位。

对此，温彬解读，这一方面是伴随疫情冲击消退，居民生活半径快速扩大，消费环境、消费秩序逐步改善，加之政策支持效果持续显现，消费和服务业数据明显反弹，带动居民短贷加快修复；另一方面，也不排除存在部分按揭转经营贷等套利行为，冲高规模。居民中长期贷款863亿元，同比增加1322亿元。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2月房地产市场有所回暖，市场情绪提升，有助于居民中长期贷款底部企稳，但在房地产回暖初期和年后提前还贷潮加剧影响下，居民按揭贷款整体仍在恢复爬坡阶段，仍有较大提升空间。

不过，2月票据融资减少989亿元，同比继续回落4041亿元。对此温彬也解读称，在信贷维持较高景气度情况下，部分银行通过压降票据资产来腾挪信贷额度的情况仍在；且随着信贷政策基调逐步从靠前发力转向节

人民币贷款余额**221.56**万亿元，同比增长**11.6%**  
人民币贷款增加**1.81**万亿元，同比多增**5928**亿元  
新增规模续创同期**历史新高**

## 2月金融数据情况一览

住户贷款增加**2081**亿元，  
同比多增**5450**亿元。  
其中居民短贷增加**1218**亿元，  
同比多增**4129**亿元；  
居民中长期贷款**863**亿元，  
同比增加**1322**亿元。

初步统计，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**3.16**万亿元，比上年同期多**1.95**万亿元



人民币存款余额**268.2**万亿元，  
同比增长**12.4%**

奏均衡，以及实体需求回升，用来冲量的票据也在减少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信贷推动下，2月社融的回暖幅度同样超过市场预期。初步统计，2023年2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3.16万亿元，比上年同期多1.95万亿元。

其中，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.82万亿元，同比多增9241亿元；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310亿元，同比少增170亿元；委托贷款减少77亿元，同比多减3亿元；信托贷款增加66亿元，同比多增817亿元；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70亿元，同比少减4158亿元；企业债券净融资3644亿元，同比多34亿元；政府债券净融资8138亿元，同比多5416亿元；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571亿元，同比少14亿元。

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认为，新增社融同比多增，主要贡献来自实体经济信贷、政府债券融资和表外票据融资改善。其中，2月企业债券融资同比继续少增，但较上个月明显改善，反映企业信用环境整体在改善。社融强劲表现，主要是国内经济前景改善，纾困、稳增长政策支持，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回暖和企业信用环境整体改善。

## M2同比增速继续走高

货币供应方面，2月末，广义货币（M2）余额275.52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2.9%，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.3个和3.7个百分点。狭义货币（M1）余额65.79万亿元，同比增长5.8%，增速比上月末低0.9个百分点，比上年同期高1.1个百分点。流通中货币（M0）余额10.76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0.6%。当月净回笼现金6999亿元。

另从人民币存款数据来看，2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268.2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2.4%，增速与上月持平，比上年同期高2.6个百分点。其中，2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2.81万亿元，同比多增2705亿元。住户存款增加7926亿元，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1.29万亿元，财政性存款增加4558亿元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减少5163亿元。

在温彬看来，M2增速延续高位，一方面是因2月信贷继续超预期放量，存款派生能力仍强。2月住户存款增加7926亿元，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1.29万亿元，分别同比多增1.08万亿元、1.15万亿元。另一方面，央行加大公开市场滚动操作以保障流动性充裕，继续为M2增速提供支撑。

周茂华则称，M2同比继续走高，主要受多方面因素影响：其中包括去年基数相对偏低；2月国内活动持续回暖，市场主体借贷活动扩张带动银行货币创造；金融机

构加大债券投资力度与积极财政靠前发力。整体看，M2同比略高于名义GDP增速，反映目前国内货币环境保持合理适度，继续为经济复苏提供有力支持。

此外，存款同比继续多增，也反映了节后居民现金回流银行体系。不过，2月非银金融部门存款下滑，也反映市场投资理财方面有所降温；财政存款同比少增，体现出财政支出力度加大，且积极财政靠前发力。

## 警惕资金空转套利行为

针对后续趋势，业内仍保持高度关注。

从金融数据可以看出，在实体内生融资需求恢复、稳增长政策驱动以及低息贷款环境下，经历1月信贷快速增长之后，2月信贷投放依然保持了较快节奏，完成了前置发力和开门红目标；政府债券、企业债券等也维持在相对高位，体现了“有力”，有助于提振信心、加快宽信用进程。但温彬也认为，年初以来过快的信贷增长，也造成部分银行负债端承压，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加快收紧、波动加大，且在低利率和规模竞争性增长下，银行净息差和营收端压力也在加大，并可能存在一定的资金空转套利行为。

为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，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平稳增长，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，满足“有效”需求，温彬提出，后续信贷投放总量与节奏需进一步调节。预计3月新增人民币贷款维持同比小幅多增，二季度开始转入相对正常的节奏，从而为经济稳固运行和可持续增长创造适宜的金融环境。

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及研究部总监庞溟则提出，在多项积极因素支持下，未来数月内信贷投放有望保持积极扩张势头。预计接下来信贷总量将保持有效增长、货币信贷将保持合理平稳增长，同时稳经济大盘政策工具将有序存续，普惠小微、绿色发展、科技创新等政策工具和大宗消费信贷支持将提质加力增效，稳健、精准地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有力有效支持。

针对后续货币政策走向，周茂华则预测，2月金融数据继续保持强劲，供需两旺，短期降息迫切性不高，但年内降准可能性仍在。一方面，国内实体经济信贷需求延续回暖态势，实体经济融资表现理想；房地产融资也呈现回暖迹象，反映目前利率整体处于合理区间。但另一方面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仍是主要矛盾，国内消费和需求恢复，需要适度货币环境支持，同时，货币政策需要平衡多个目标，后续政策不排除继续适度降准（定向降准）加大薄弱环节和重点新兴领域支持，激发微观主体活力。

北京商报记者 刘四红

# 千亿中加基金迎新董事长

千亿规模公募迎来新一任董事长。3月11日，中加基金发布董事长变更公告表示，因工作安排，董事长、法定代表人夏英于3月10日离任，由夏远洋自3月10日起新任董事长、法定代表人。

公告显示，夏远洋于2002年7月加入北京银行，从事银行公司治理相关工作；2007年10月起，历任朝外支行行长助理，总行资产托管部副总经理、分行纪委书记等职务。于2012年12月-2014年3月参与筹备中加基金并担任公司首任督察长。

据了解，中加基金成立于2013年3月，是第三批银行系试点基金公司，公司注册资本4.65亿元，注册地为北京，目前共有六家股东，分别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持股比例44%）、加拿大丰业银行（持股比例28%）、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（持股比例5%）、北京乾融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持股比例12%）、中地种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持股比例6%）、绍兴越华开发经营有限公司（持股比例5%）。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，截至2022年12月31日，中加基金非货基规模达到1125.05亿元，在全市场公募非货基规模中排名第43。

事实上，不仅是夏远洋，中加基金历任董事长均与股东方北京银行有关。据悉，中加基金首位董事长闫冰竹，自1996年参与组建北京银行并出任首任行长，2002年起任北京银行党委书记、董事长，2013年10月21日正式履职中加基金董事长。在四年后的2017年7月31日，闫冰竹因工作原因离任。2018年1月26日，空缺近半年的董事长一职迎来了曾任北京银行办公室副主任、阜裕管辖行行长等职务的夏英。

虽然夏英去向暂未公开信息，但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，有市场消息称，夏英将回归北京银行总行轮岗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包括中加基金在内，截至3月12日，2023年以来共有38家基金公司发生高管变更，共涉及56位高管，其中包含10位董事长、12位总经理以及25位副总经理的人事变动，其余则涉及到督察长、首席信息官的人事变更。2月中下旬，公募行业更迎来董事长“扎堆”离任，接连有新华基金、易米基金、建信基金、富荣基金发布董事长离任公告。

例如，3月2日新华基金发布高管变更公告，新华基金董事长翟晨曦因个人原因离任，总经理于春玲自2月28日起代任董事长一职。同日，易米基金也发布董事长变更公告，官宣梁旭自2023年2月28日起新任公司董事长一职，原董事长郭之英改任公司副董事长。

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认为，2023年以来高管频繁变动，每家基金公司可能都有不同的原因，总体来看，可能与年后的时间节点有关，针对高管2022年年终的业绩考核，基金公司董事会也会做相应的评估，根据结果进行部分调整，或成为年初以来高管频繁变动的原因。

在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看来，“客观来说，基金经理对基金业绩变化有直接影响，而董事长对于基金的整体业绩影响是相对有限的。但需要注意，董事长、高管团队的大规模变动，可能会因董事长本人风格、举措的变化，影响基金经理决策、进行基金产品运作，导致基金在选品、设计上可能出现变化，进而影响到基金整体业绩”。

杨德龙指出，高管变动可能对公司经营产生一定的影响，主要需关注高管变动后，新履职的高管具体管理能力如何。如果能够有管理能力更强的高管来掌舵，那么对于公司整体而言是相对正面的，反之则有可能是负面的。此外，若一家机构的高管频频变更也可能影响投资者情绪，或不利于基金公司的长远发展。

北京商报记者 刘宇阳 郝彦